

黄苇町 李凡

当代中国的

消费之

——困惑与思考

迷



中国商业出版社

黄苇町 李凡

当代中国的

消费之

——困惑与思考

迷

中国商业出版社

当代中国的消费之谜

困惑与思考

黄苇町 李凡 编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滦南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10.5 字数230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044—0979—1/F·417

定价4.20元

目 录

1·喜中含忧 忧中有谜·····	(1)
1·1 阿尔希波夫的惊讶·····	(1)
1·2 补还“欠帐”之后·····	(8)
1·3 “排浪式”与“超前式”·····	(12)
1·4 粮食消费进入21世纪·····	(20)
1·5 用煤换来的香水和唇膏·····	(22)
1·6 工厂拉闸限电与消费电气化·····	(27)
1·7 市场、工厂为什么“打摆子”？·····	(31)
1·8 过高的吸储成本与隐患·····	(38)
1·9 当代中国的消费之谜·····	(43)
2·三十年战略选择·····	(50)
2·1 为两大目标服务的集中分配体制·····	(51)
2·2 低工资、高就业、多福利·····	(54)
2·3 低物价、高补贴和限量消费·····	(57)

2.4	低消费、高积累与低分配、高扣除.....	(58)
2.5	大平均、小差别.....	(63)
2.6	消费与非消费资金分流.....	(64)
2.7	农村的分配格局.....	(66)
2.8	居民消费生活特点.....	(71)
2.9	传统体制利弊观.....	(73)
2.10	解谜之始——转变中的失衡与失控.....	(79)

3	先富者与“带头羊”.....	(85)
3.1	传统分配制度的突破.....	(85)
3.2	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崛起.....	(92)
3.3	两栖型的高收入者.....	(102)
3.4	进入“市场块”的公有制企业.....	(111)
3.5	过热消费的“带头羊”.....	(119)
3.6	解谜之一——谁在高消费？.....	(130)

4	轻车熟路的福利扩张.....	(135)
4.1	企业——过路财神.....	(135)
4.2	挣死工资者的“活钱”.....	(143)

4.3	“菜蓝子”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149)
4.4	越背越重的补贴,越盖越缺的住房·····	(155)
4.5	消费过热的黑马·····	(161)
4.6	解谜之二——看不见的收入·····	(167)
5	·公款消费之天国·····	(170)
5.1	特殊形态的社会消费·····	(170)
5.2	越“拆”越多、越“赶”越大·····	(175)
5.3	会议消费与发“会议财”·····	(177)
5.4	最大的超前消费·····	(181)
5.5	中国的“吃喝疯”·····	(185)
5.6	解谜之三——“社会扣除”的扣除·····	(193)
6	·八方渗漏、“供血不足”·····	(202)
6.1	预算外资金的“用途”·····	(202)
6.2	生产经营资金的流失·····	(210)
6.3	应纳税金渗漏为消费基金·····	(221)
6.4	“双轨制”租金的去向·····	(224)
6.5	未交给“地主”的地租·····	(233)

6.6	国有资产的命运.....	(239)
6.7	被消费的明天.....	(244)
6.8	解谜之四——“谜”的代价.....	(254)

7	过热消费探源.....	(256)
7.1	在三种示范下的心理骚动.....	(257)
7.2	分配不公与攀比效应.....	(261)
7.3	个人既期收入与消费最大化倾向.....	(270)
7.4	尚未排除的隐患.....	(276)
7.5	公平? 效率? 还是二者皆无?	(280)
7.6	解谜之五——“心之迷”	(289)

8	思考和对策.....	(291)
8.1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291)
8.2	关于消费之谜的思考.....	(292)
8.3	治理消费过热的对策.....	(301)
8.4	结束语.....	(327)

后记



喜中含忧 忧中有谜

1.1 阿尔希波夫的惊讶

正值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高潮中，由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这是60年代初中苏交恶后，正式访华的级别最高的苏联代表团，自然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大批记者云集北京。其中的苏联东欧国家记者中，不乏第一次来华者。他们不仅希望能从这次采访中，获得中苏关系解冻的重要信息，也希望能亲眼看一看众说纷纭的中国改革的真实情况。

的确，百闻不如一见。不仅初来者感到不虚此行，就是身为中苏友协主席的阿尔希波夫，在他亲身踏上阔别20多年的中国土地，并经历了北京、武汉、广州、深圳这一纵贯大陆的旅行之后，也不由对今非昔比的重大变化感到惊叹不已。城市中鳞次栉比的具有国际水准的饭店、宾馆和旅游设施，到处在紧张施工的住宅建筑群，商店中琳琅满目的各种高档消费品和物美价廉的日用商品，以及摩肩擦背的购物人流，装修富丽、菜肴可口、宾朋满座的中西餐馆，还有

老人、孩子开朗、健康的笑脸，中国姑娘款式各异、色彩明快、甚至可与东京和巴黎女郎相媲美的时装。所有这一切，都令客人们感到目不暇接，不知怎样把眼前的一切，同70年代西方长期宣传的“食品配给”和“蓝蚁军”的中国形象重合起来。有些见惯了本国市场上消费品质粗糙、款式陈旧并且供应紧张、数量匮乏现象的记者，相比之下，更对中国市场的丰富多彩和人民的消费生活质量感到羡慕。

比阿尔希波夫稍后来访的《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回到莫斯科后发表了一篇访华观感。他说：“我们没有看到伸手乞讨的人和挨饿的人。中国人是朝气蓬勃的，大多数人穿得不错，现代装束。在许多大小商店和大小市场上，以及在街头货摊上和商贩的手里，我们见到大量的食品。”他认为，对于一个长期面临众多人口吃饭问题的经济落后的中国来说，改革的成果是巨大的。

阿尔希波夫和阿法纳西耶夫，这两位昔日的“老大哥”，都对中国的改革，给以高度的评价。而中国居民已达到的消费水准和生活质量，中国市场上极为丰富的消费品，是留给他们的最深刻印象之一。

是的，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中国改革成就中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社会经济统计表上，排列着一连串非同凡响的数字：

1978—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均增长了1.5倍左右，在世界经济面临衰退和波动的情况下，中国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增长率。仅从农业来看，在这10年中，全国粮食产量增长了9800万吨，据有人计算约占世界同期粮食增产总量的50%左右。就是说，世界每增产两公斤粮食，就有1公斤产

自仅占世界耕地面积1/13的中国的农田里。1989年全国家禽存栏数已达22亿多只，比1978年增长1.85倍，跃居世界之冠。在过去10多年里，世界禽蛋产量增长36.2%，人均占有量从6.2公斤上升到6.9公斤，而同期我国禽蛋产量增长了197.2%，人均占有量从2.4公斤上升到6.3公斤，这一水平已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人均禽蛋占有量3公斤的水平，而接近世界人均6.9公斤水平。^①正是生产的大发展，为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

1989年和1978年相比，全国人均消费粮食由195.5公斤增加到了242.3公斤，食用植物油由1.6公斤增至5.4公斤；猪肉由7.7公斤增至15.6公斤，食糖由3.4公斤增至5.4公斤，主要副食品的人均消费量均增加了1倍到2倍。从人均消费量看似似乎并不多，但如果考虑到这是全国包括农民在内的11亿多人口的平均数，而且这种人均消费量的成倍、成两倍增长是在此期间又净增了1亿5千万人口的基础上，这个增长确实是十分可观的了。我国人均每年摄入蛋白质已达67克（欧美发达国家为100克），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985年人均每日食物热值已达2620大卡，与2694大卡的国际水平相差无几。

就穿的方面来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0年我国人民衣着消费为414亿元，1988年达到1070亿元，1989年进一步跃升为1108亿元。到1986年我国人均纤维消费量便已达10.6公斤，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3.8公斤水平。而且，更突出的变化反映在服装质地和款式上。我国街头不再是中山装、

^①引自1990年9月6日《人民日报》

军便服的“一统天下”，昔日“厚、重、硬”的服装正逐渐被“轻、软、薄”所代替；全国每年设计出的服装新花色品种达10万个，中国人民的服饰消费已明显地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

从住的方面看，1979年至1989年，我国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达2500亿元，建成住宅13.5亿平方米。1978—1988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4.2平方米增至8.8平方米；②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10.17平方米，增加到16.6平方米。近10年来，我国新建农村住宅62亿平方米，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2倍，全国8600万农户迁入新居，占农户总数43.7%。在这样短时间里如此普遍地庆祝“乔迁之喜”，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亘古未有的。而城市中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也已相当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时的居住水平。

耐用消费品的社会拥有量，是十年来增长最猛的。“老三件”的缝纫机，由1978年的3396万架，发展到1988年的12897万架；手表由8602万只，发展到51473万只；自行车由7426万辆，发展到33312万辆，分别为10年前的4—6倍。

“新四大件”则更突飞猛进。1988与1978年相比，电视机由304万台发展到14344万台；电冰箱由9万台发展到1927万台；洗衣机由1万台发展到7464万台；录音机由163万台发展到9116万台，增长倍数以十、百、千计！十多年前，仅在少数高级领导干部、高级学者和出国人员家庭中才偶尔得见的“昔日王谢堂前燕”，今天已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②《中国统计年鉴1989》

为人民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是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1989与1978年相比，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平均每万人口有网点数，由13.0个，发展到102.3个；有从业人员数，由63.1人，增加到254.5人，分别比11年前增长了38倍和4倍左右。加上商品的丰富、供给的改善，60——70年代中国街头到处排队，“长蛇阵”跨街进巷的景象已成为历史，而群众生活中的诸难问题也大大缓解。

城乡居民储蓄水平，是衡量人们消费品购买能力的重要方面。1978年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只有210.6亿元，人均仅20多元，而其中7.9亿农民，储蓄存款55.7亿元，人均只有7元钱！这7元钱当时可以派什么用场呢？买棉布不够一个成年人做一身单衣，买口粮（原粮）只够一个10岁的孩子吃两个月。而且，这7元钱还是平均数，是“中等收入”农户的储蓄水平，说明当时相当大一部分家庭实际上没有余钱储蓄，甚至负债。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许多家庭终年见不到钱，油盐酱醋甚至孩子上学的练习本、铅笔，都是靠积攒鸡蛋兑来的。“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这确实是许多家庭实实在在的消费方式。而到1989年底，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146.9亿元。其中农户储蓄也已达1412.1亿元。人民手持现金还有1704亿元。如果再加上个人购买的国库券、债券还有400亿元，中国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已有7000多亿元，人均占有水平已达600元左右。扣除价格因素，增长幅度之大也是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

家家有余，民富国强，这曾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理想。从谭嗣同到方志敏，为了使积贫积弱的祖国得到振兴，为了让那些啼饥号寒无法生存的同胞获得饱暖

无虞的生活，不知有多少英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还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来，为带领人民抗灾治穷而鞠躬尽瘁的焦裕禄、王国福等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共产党人。今天，他们的理想已经在一步步变成现实：我国人民的生活终于从长期贫苦、停滞的状况中走了出来。全国绝大多数人口过上了温饱的生活。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少数贫困地区，人民生活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社会过渡。部分首先富裕起来的家庭的消费生活，已超过了小康水平……。

路透社记者马克·奥尼尔在他撰写的文章中说：“既使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过去10年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可观的”。而奥地利《维也纳日报》1990年7月4日公布的统计资料也指出，1980——1989年，10年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遇到了困难，不少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现出负增长，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较好，整个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加5.3%。在亚洲，又以中国的发展最为迅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7.7%，超过亚洲“四小龙”（南朝鲜、新加坡、台湾和香港）6.9%的经济发展速度。美国《商业日报》的一篇文章在列举了一系列国际贸易方面的统计数字后，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在许多方面的消费，正在迅速地赶上现代世界”。^③

60多年前，在阿尔希波夫和阿法纳西耶夫的故乡，列宁曾说：“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

^③ 引自1988年11月1日 美国《商业日报》。

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应该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全体劳动者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证实了列宁在60多年前作出的论断的正确性。

当然，我们为真正了解这一真理，是付出了代价的。尽管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阐明：“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30年时间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并未能始终坚持这一正确的方针。人民的消费水平提高得很缓慢，甚至出现了长期的停滞和负增长。以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经济战线上长期“左”的错误，当人们通过刚开启的国门张望外部世界时，不由吃了一惊。在我们内战正酣、动乱不止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世界已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50年代和60年代人民生活状况与中国相仿，甚至还不如中国的一些亚洲邻国，已通过经济起飞迅速缩短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也迅速拉开了同中国的差距。那时，人们不免自惭。许多人甚至怀疑，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如此巨大的经济差距能否缩短，我们这样一个背负着10多亿人口的贫困落后的大国，在错过了几次重要的发展机会之后，还能否与世界保持同步前进的速度？那时，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10年后中国人民的生活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消费水平和生活

^④ 列宁 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85页。

质量跃升的速度，能令东方和西方都感到如此惊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生活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它作为改革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赢得了国际上的交口称誉。同时，它也使绝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到，我们的国家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缩短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进入小康社会，已不是可望而不可既的事了。

1.2 补还“欠帐”之后

成就是伟大的，但讴歌成就的更多的工作应由诗人来承担。经济学者的责任，则是要通过对经济运动变化过程的分析，来认识和把握今天的经济现象，通过对今天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迹象的跟踪和剖析，来认识它未来的发展趋势，研究如何因势利导、兴利除弊，促进社会经济生活健康、平稳地发展。因此，在我国人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的巨大成就面前，我们要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这种高速增长的成因及其可能产生的各种倾向上。

改革10年间，全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提高了109.9%，其中农民提高了118.1%，非农居民提高78.4%。尽管这个统计数字与实际增长数字相比（后者还包括现实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的统计外洒漏部分），是相当保守的，但这个增长率也已相当高了。

改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工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使农村经济恢复了生机，农业潜能得到极

大释放。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直接用于生活消费和作为食品工业、轻纺工业原料的产品的大幅度增产，还有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巨大增长，这些，都为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显然，没有改革和开放所带来的经济繁荣、生产发展，是不可能有人们的今天的消费水准的，因此我们说它是改革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但是，也应当看到，人们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并不完全是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先看改革的头几年。从1979—1982年的4年间，国民收入使用额由2975亿元增加到4290亿元，净增1315亿元。其中用于消费方面的，高达1166亿元，占88.7%，用于积累方面的，仅为149亿元，占11.3%。也就是说，新增加的国民收入，近90%用在了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方面。而在国民收入的积累基金部分内部，主要用于住宅和其他文化福利设施投资的非生产性积累的比重，由1978年的28.2%，上升到53.6%。这样，如果把新增加的国民收入中的消费基金增量和积累基金总额中的非生产性积累比重扩大两项变化综合考虑，不仅新增国民收入全部用于改善人民生活，而且还挖了原来用于发展生产的份额。

这种变化必然从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中反映出来。为了使产品结构同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结构相适应，国家努力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关系，压缩重工业和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规模，拿出大量资金、设备、原材料用于发展消费品生产，包括大批军工企业也转向摩托车、洗衣机、电冰箱等民品生产。在国内生产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还通过

大量进口消费品来平衡市场供求。

由于过去长时期“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从而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欠”了“帐”。因此，在一定时期内，有计划地压缩积累、提高消费基金比重；压缩生产性积累、提高非生产性积累比重，是必要的。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和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建设积极性，而且也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重工业畸重、轻工业畸轻的不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

因此，改革初期我国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有生产发展的因素，也有党和国家有意识地扩大国民收入中的消费和非生产性积累的份额的因素，即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再分配因素。具体是通过在农村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在城市中普遍提高职工工资和恢复奖励制度，增加居民住宅和文化福利设施投资来实现的。

人民消费水平的这种迅速提高，确实起到了振奋精神和把广大群众吸引到改革的旗帜之下的作用，但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错觉。似乎每一项改革都必然要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而生活水平提高也成了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志。有的人忽视了收入提高中的再分配因素，对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的发展持盲目乐观态度，甚至不切实际地提出“改变食物结构”、“用高消费带动生产”等主张。而且，一些舆论工具将国外消费方式不适当地加以宣传引进。一时艰苦奋斗、勤俭持家、艰苦朴素的传统不再提了，“能挣会花”成了新口号，加上国内特区的消费示范，更加重了人们的错觉。消费增长的刚性作用也很快显露出来了。1984年以后，在国家为补还人民生活欠帐已投入全部新增国民收入